

第七章 在北京的三年

初交的北京朋友

这是我在北京交的第一个中国的“新朋友”。他是被派到新侨饭店工作的某出租汽车公司的一名出租车司机。我作为特派员上任后，在那个饭店住了一个多月。他五十开外，冷静稳重，富有理智。这是距今已二十五年前的事儿了。

出租车司机

日中邦交正常化（1972年9月29日）的前不久的一段时间里，从日本来的要人极为频繁。为此我去机场的机会也很多。一天早上，我去机场为一位刚刚结束了与周恩来总理和日中友协会长廖承志的重要会谈后而回日本的著名政治家送行，在那儿我第一次认识了这位司机。

去机场的大路两边是上班的自行车洪流。大型的无轨电车在中间缓缓地穿行。沿途两旁一排绿绿葱葱的林荫树，一眼望不到头。

我刚从日本来北京不久，这里早晨的风景使我极感新鲜。同时，东京早上上班的风景也不由出现在脑海里：混乱拥挤的电车和地铁，一辆挨着一辆的汽车洪流，久积不散的汽车排出的废气，咽咽一息的林荫树——。

“北京的早上真好啊。骑自行车上班，特别有助于健康。”

我不由地这么说。司机听了，却回答说：

“听说日本的工业特别发达。相比起来，我们是大大落后了。”

跟那位司机的对话就是这么开始的。后来，经常碰到他。坐了五、六次他的车后，我们之间的感情也就开始慢慢的沟通了。

拒绝拍照

日中建交这件大事结束后，在一个秋高气爽的日子里，我去游览了北京市西北方向七十多公里远的八达岭长城。那次也是坐那位司机的车去的。“不到长城非好汉”——中国各地的游客蜂拥而至，大家都尽情地领略深秋的景色。

我爬到了八达岭的最高处。然后一边欣赏农村的风景一边踏上了归途。那时虽然秋忙时期已过，但还是不时能看到有人在干活。不一会儿，在路的左边，看到了一群农民正在埋头收获小米。我想把这个场面拍下来，就告诉了司机，司机说了一句，“试试看吧”，就把车停了下来。

那一群农民全是妇女。她们见到一个西装革履的老外突然“闯”过来，眼里都露出不知所措的神色。那时还是文化大革命时期，对外闭塞，但举止有礼的时代。我直截了当地说明来意后，刚想拿起相机拍照时，一位上了年纪的老太太抬起头，说了一句“请不要拍。”

事先也毫无联系突然闯到这儿来的这个男人是什么人？来的意图是什么？——她们肯定是这样想的。

我只得顺从了那位老太太的意思。一般的情况下，要参观或采访时，要有中国方面的人一起陪同，这在当时是惯例。我在日本养成的新闻记者的习性，自以为这样做一点儿恶意也没有。但是，“入乡随俗”，那次拍照也只好作罢了。

司机师傅帮我交涉

又走了一会儿，这次看到在路的右边有很多农民在刚收割完的地里翻土。鲜红色的拖拉机在人群中穿行着。看到这副沸腾的场面，一种“职业意识”又开始欲动。我把我的意思给司机一说，司机小声说了一句，“试试看吧”，又把车给我停了下来。

我顺着田埂走到了拖拉机旁边。但结果还是同样被拒绝了。那些农民在我的背后喊着，“下次再来吧，可一定得要有人陪同哟。”这话对我是一种安慰，但心里却想，失去这么好的机会，真可惜。我脑子里一直在构思，要把“北京的秋天”拍成画报，让日本的读者们看看。

眼看车马上就要进入北京市区了。心想这次是没指望了，这时突然看到有一群小孩儿正在那儿一个劲儿的剥收获的玉米皮。不由得心一动。刚才几遭拒绝的事儿早给忘了。

我第三次对司机说了自己的意思，他一边回过头，一边说，“你这个人太老实，别吱声拍了就行。”

我有点犹豫，但还是下了车对准了镜头。这时，一位照看孩子们干活的老人，使劲儿摆着手，大声喊，“不行!!”

按快门的手不由得停了下来。好坏不过三，可这次也还是被干脆地给拒绝了。

就在这时，司机从车上下来了。他一声不吱，从路边的一条宽宽的水沟上跳过去，向大声喊“不行”的那位老人那儿走去。好像在一个劲地向老人解释着什么。这下看来话说通了，他俩朝着我喊道，

“来吧!”

司机看到我屡遭拒绝心表同情，自愿为我当了“陪同”的角色。我一阵高兴，朝干活的地方飞跑过去。大家都笑着欢迎我。我按下快门，把眼前的场面尽情地收到了镜头里。

“清一色毛泽东”的背后

是文革期间规章制度森严，还是不习惯被不认识的人作为“拍照对象”？

试了三次，三次都被拒绝，这件事使我不禁强烈地感到，在中国人中存在着一种划分“界限”的态度。

同时，深深佩服那位司机的诚意和勇气。对他来说，碰到我这个不懂中国世故的日本人，是个多大的麻烦。但是，当他说了“你这个人太老实，别吱声拍了就行”，而我又遭拒绝时，他对自己说的话勇担责任，马上为我进行了交涉。

我跟这位司机之间，还有一件难忘的事情。

有一次，他问我，“田中首相在日本一定是非常受欢迎的吧。”

“当然，正好也是赶上了日中实现邦交正常化这个时期。”我回答说。接着我又说，“说是非常受欢迎，也就百分之六十左右的比例吧。日本人有不同想法的人很多。”

司机听了说：“中国的情况也差不多。毛主席语录满地是，但把毛主席当作神的人也就百分之六十到七十之间吧。”

当时，街上能称得上有招牌的地方全都是写的毛主席语录。书店也全是毛主席著作。完全是一个“清一色毛泽东”的世界。

听了司机的话，使我感到这可是一个令人吃惊的新发现。在这个世界背后，还有这种“实际情况”啊。特别是，他能毫无顾忌地对我这个外国人把话讲得这么明白，使我感到他对我那种极大的信赖感。

“言必信，行必果”

后来，我们一家离开新侨饭店，搬到了建国门外齐家园的朝日新闻社的北京分局里。不久，由于改建，半年后新侨饭店就关闭了。以前饭店的那些司机也随之调到了别的地方。由于每天忙于工作，那位司机的事也慢慢地淡忘了。

几个月后的一个晚上，我正在翻看刚出版的《人民中国》（1973年1月号）。上面一行的“沁园春——祝中日恢复邦交”使我不由得又清晰地想起了那位司机。这是现已故的中日友协的名誉会长郭沫若写的一首词。在这首词里，他回顾了日中之间两千年的友谊，并强调了邦交正常化的意义。词是这样结尾的。

“从今后，望言行信果，和睦万邦。”

我的眼睛停在了“言行信果”这四个字上。

这是从“言必信，行必果”转来的。邦交正常化谈判的最后，周恩来总理送给田中首相的那副毛笔写的条幅就是这六个字。其含义是，“说话要讲信用，行动必须果断。”

“朝着那位老人走过去”的那位司机的形象，又清晰地出现在我的眼前。

邓小平戏剧性的复出

在北京当特派员时的回忆写都写不完。在这儿，只讲一下文革后期象征性的动向及与日中关系有关的一段轶话。

从人民大会堂发出的第一个报导

1973年4月12日晚上，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召开了欢迎从柬埔寨解放区视察回京的西哈努克亲王夫妻的宴会。在大型的宴会厅里，出现了与往常不一样的现象。

我往主宾席上一看，那上面不是坐着身材矮小但面色红润的邓小平吗？我同桌的一位外务省报道局的人在低声告诉我，邓小平已作为“副总理”重新出来工作了。文革初期，邓小平曾被红卫兵打成仅次于刘少奇国家主席的“第二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受到猛烈批判。从1966年12月开始没有在公开场面露面以来，已过了六年四个月。

“得尽早把这一消息报告给东京，”我这么想。但那时从北京发给东京的采访内容都是从朝日新闻社的北京分局或电信局发出的，也根本没想到能从人民大会堂跟东京的总社用电话联系。但是，当时“邓小平复出”这一消息，不但是对外国人，对中国人也一定是一个特大的好消息。

外务省的官员在我一再催促下，点头答应了我的要求。告诉我在黑色幕布隔起来的大型宴会厅的那边，有电话可以利用。

那儿真的摆着电话机。我马上要通了电信局，话筒里传来了熟悉的女话务员的声音。心想“太好了”，说了一声“对方付款”，然后报上东京总社的电话号码，马上就接通了。

我先说了“邓小平已复出”，然后把浮现在脑海里的这一天的情况，邓小平过去的经纬及这次重新出来工作的意义作了汇报。

北京机场的一段对话

从外部来看，邓小平自公开场面没有露面以来，人们都认为他跟刘少奇一样，完全下台了。但是自“林彪事件”（1971年9月）发生后，文革后期本着毛泽东主席的“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在文革初期遭到批判的领导人中，不少高级干部都陆续重新上台了。其中，有原来的党的副主席兼副总理的陈云及原共青团总书记胡耀邦。

但是，一连串的措施达到了邓小平的复出这一阶段，这可是值得特笔的象征性的事件。这里有大大动乱的文革和令人震惊的“林彪事件”所引起的党、政、军，特别是军队内部人事方面的后遗症需要纠正、还有观察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的动向制定新的国际战略部署这个重大任务在等着。

那次宴会的三天后，我有机会跟邓小平直接进行了对话。那是4月15日，中日友协访日代表团（廖承志会长任团长）一行五十五人离开北京机场的那天早上。刚复出的邓小平陪同李先念副总理也在那儿。中国方面还有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副委员长兼中日友协名誉会长的郭沫若，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副主席傅作义及各界代表。日本方面有小川平四郎大使及在京日本人，总共大约有500人为代表团送行。

人们的视线，一直关注着邓小平的一举一动。我极力甩开中国外交部官员的阻拦，走到非常靠近的地方，对邓小平说了一句，“（您的复出）我们日本人也感到非常高兴”。

邓小平略显惊讶，但非常有力的回答道：“谢谢，谢谢。”

大刀阔斧进行军队改组

对一直被强调要进行激烈的阶级斗争和政治学习的一般北京市民来说，邓的复出犹如一付巨大的“清凉剂”。当时街头巷尾对邓小平的评价是“敢说，敢做，很公平，工作能力很强”等等。

邓小平也不负众望，工作竭尽全力，地位也直线上升。文革前他是负责党中央日常事务的，文革初期遭到批判，被撤销了党内外一切职务，降到只剩“一名普通党员”的身份。

在相隔四年半后即73年8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大会上，邓小平复出为“中央委员”。第二年的74年1月1日发表了在进行建国以来最大的军队改组工作中，邓小平有很大的功劳，不久邓小平又升格为“中央政治局委员。”

这件工作是要纠正文革前半期由林彪主管人民解放军时所造成的弊病，在当时全国十大军区和一个直辖军区（即新疆军区）中，有九个军区的司令员要进行调动，这是一件困难极大的工作。这次改组的最大的特点是：①把一直由军区司令员一手抓的党、政、军三权进行分散；②与以前军区司令员调动时带走一批重要干部的做法不同，这次军区司令员调动只是单身赴任。

负责这次大刀阔斧改组的就是受毛主席和周恩来的指示和委托的邓小平。

在联合国提出“三个世界的理论”

不久，传来一个令人寂寞的消息。1974年1月21日，邓小平副总理会见在北京访问的自民党众议院议员一行时说：“周恩来总理工作繁忙，而且已是高龄了，已经决定我们分头来接待客人。”

这个决定慢慢地付之实施。一些外国元首或首相访问中国的时候，主要接待人名义上是周总理，但实际上，邓小平和李先念两位副总理“受周恩来总理的委托”，代理接见的情况多了起来。

分担周总理工作最多的是邓小平。这一点越来越明显。同年4月，邓小平还作为首席代表参加了联合国召开的资源特别总会。

那次欢送的场面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北京机场党和国家最高领导的人都在场，有周总理、林彪下台后在第十次党大会（73年8月）上青云直上的王洪文国家副主席，江青女士（毛主席的夫人），及原中央政治局委员、“四人帮”的成员之一的姚文元，也有与邓小平一样被称为“实务派”的李先念副总理。另外还有数千名北京市民也到机场热烈欢送。

看到这个场面，我感到与其说这是做给“国外”看的还不如说是让“国内”人看的。这其中最大的意图是，让在文革这场大动乱中遭到批判的人恢复自信，要显示出在晚年“毛泽东路线”——即“继续革命”“批判现代修正主义”的基础上，达成新的团结。

在这次联合国特别总会上，作为中国一种新的国际认识，邓小平第一次公开提出了把世界大致分为“三个世界的理论”。①两个超级大国；②发达国家（即日本、西欧等国）；③发展中国家（即第三世界各国）。并明确表示，中国属于发展中国家，要与“第三世界”联合，与“第二世界”扩大友好关系，与“第一世界”的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特别是苏联的领导人要进行斗争。

成为仅次于毛、周的实权者

邓小平推进的内外政策及取得的成果得到极高的评价，在新召开的党中央全会上提升为党的副主席兼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75年1月召开的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当选为第一副总理，同年29日就任解放军参谋长。

当时，排在毛主席和周总理之后的党中央“第三号人物”是“四人帮”的年轻之星，文革时期的理论家王洪文副主席。但邓小平在党、政、军各方面都占有不可动摇的重要地位。

75年4月，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即北朝鲜）的金日成主席访问中国时的情景显示了一个令人刮目相看的动向。负责接待这次来自极其重要的兄弟国家的党和国家主席的竟是邓小平。邓小平同金日成主席同乘敞篷车，受到了几十万市民的热烈欢迎。这使我强烈地感到，他已成为仅次于毛主席和周恩来的“实权者”。这次是我在北京呆的时间里，看到的最盛大的一次欢迎场面。

回顾复出后邓小平所走的足迹，可以看到，随着时间的推移，他的职务的提升及他的活跃越来越引人注目，到了1975年的盛夏，已达到顶点，而那时我在北京的特派员任期已满，于是回到了东京。

俗话说：“祸中有福，福中有祸”。就在邓小平获得光辉业迹的同时，批邓的黑烟又冒了起来。

“血红的夕阳”与“大庆油田”

去北京赴任快两年的 1974 年夏天，驻北京的外国人特派员代表团有机会第一次去参观在东北地区（即旧满州）发现的中国最大的石油基地——大庆油田。“农业学大寨、工业学大庆”——自 1964 年毛泽东主席向全国发出这样的号召以来，正好是十周年。那时，由于第四次中东战争的影响，日本正陷于“石油危机”。

中国最大的石油基地

大庆油田大量喷出原油是在 1959 年。这一年正值新中国成立十周年之际，据说是为了庆祝十年大庆，才给油田取了“大庆”这个名字，顾名思义，“大庆”是“大大的庆贺”的意思。

在 1959 年以来连续三年的自然灾害中，苏联突然撤走了技术人员和专家。中国共产党内部又出现了“两条路线”的暗中斗争，大庆油田的开发就是在这种内外多难的时期进行的。这也是按照毛主席发出的“走自己的路”的最高指示所进行的。

“牛是一种付出得最多，但最不求享受的动物。让我毕生都做党和人民的牛吧。”

“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是我们的传家宝，是国家建设永远不变的方针”。

这是大庆油田的带头人、不幸死于癌症的“铁人”王进喜留下的豪言壮语。

由于大庆油田的开发，中国在 1963 年就成为了石油自给的国家。后来陆续又开发了胜利油田和大港油田，山东省的六·二三油田和湖北省五·七油田。再后来在四川省和甘肃省也发现了新的油田。不少外国专家长年一直主张的“中国贫油国”被推翻，中国从此奠定了坚强的工业近代化基础。

向石油危机中的日本出口石油

由于大庆油田是第一次向外国记者公开大部分驻京特派员都参加了这次采访旅行。这里面还有两名苏联塔斯社的记者。这次公开可以被理解为向世人证明，尽管苏联全面撤走了技术人员，中国仍有自信依靠“自力更生”取得成果。

对我来说，这是生平第一次去东北地区。因此，我很高兴在视察大庆油田的同时，能亲眼看到东北辽阔的大地。

在持续酷暑的 7 月 24 日的傍晚，我们坐上了由北京开往黑龙江省府所在地哈尔滨的特快火车。第二天天亮时，火车到达了东北地区最大城市沈阳。

在那儿我们第一次看到了满载着原油的油罐车。听说，这些原油是从大庆油田运往辽东半岛尖端的旅大（旅顺和大连）的。其中大部分再从那儿出口到日本。后来，在去哈尔滨的火车上，我好几次都看到由五十节到六十节车厢连在一起的石油油罐车。一派运送繁忙的景

象。

前一年的10月，发生了第四次中东战争，以此为契机，阿拉伯诸国决定采取“石油战略”，减少原油的供应量，一时石油价格暴涨。直接冲击了大部分石油一直依赖中东地区的日本。同年11月，日本陷入深刻的“石油危机”之中，出现了价格互涨的现象。当时日本妇女抢购手纸的消息，在中国也成了热门话题。

从73年末到74年春天，日本要求中国能提供石油，不但石油界和财阀界的首脑，而且政界代表团也频繁地访问中国。连原社会党委员长佐佐木更三也来中国会见周恩来总理，一个劲儿地“乞讨石油”。佐佐木曾说过“伙计，农村的温室保温也要烧油啊！”这句话给我的印象很深。

车窗外的东北大地

从沈阳、长春到哈尔滨，这一段东北地区的大平原上，车厢两旁长势旺盛的小麦、大豆、玉米等尽收眼底。就在这次来大庆前，西方一部分消息还报道说东北地区那年的夏季作物长势不好。当然，东北地区辽阔宽广，但如果仅从这条横穿南北大铁道的车厢所看到的情况，一点也没有长势不好的迹象。

晴空万里，沿途两旁到处能看到开放饱满、长得又圆又大又高的向日葵。葵花中心的茶色与花边的黄色，交织相映，在阳光下，分外鲜艳。

从北京到哈尔滨全海一千三百八十八公里，特快走了十八个小时。我们在哈尔滨稍微休息，又转乘了下午两点开往齐齐哈尔方面的火车。我们要去的是大庆油田基地车站之一的萨尔图，此地处于哈尔滨与齐齐哈尔之间。

窗外仍然是一望无际的大平原。大概走了快两个小时吧。这时草原慢慢取代了小麦和玉米。列车再行驶一会儿后，便看到了草原上东一块，西一块的略带白色的土壤。不知谁说了一句，“这是碱性土壤。”列车看来是朝着大庆油田的东端行驶着。

血红的夕阳述说今昔

不知什么时候，血红的夕阳已经在慢慢地接近前方遥远的地平线了。这夕阳是我至今为止见到的最大的，也是最红的。我们乘坐的列车似乎是在追赶着那即将落下去的夕阳在飞奔着。

突然，小时候学的一首“军歌”的一段歌词浮现在脑海里：

遥遥祖国几千里，

迢迢满州夕阳红。

荒草野地乱石下，

霞光一片照我友。

我上中学二年级时正好赶上日本战败，属于没上过战场的那一代。但在上小学时，学会了不少“军歌”。当时，不管是哪首“军歌”都有吹捧那场战争“勇猛”的句子和旋律，但这首军歌是对战场上倒下的战友的思念，旋律也带着悲哀。现在生平第一次在东北看到了“血红的夕阳”，不知为什么，却勾起了我少年时代的伤感。

但正是在这支歌的背后，日本的侵略战争渐渐扩大，使得无数无辜的中国人民遭受了残酷的无可挽回的牺牲。“满州事变”扩大为“支那事变”，进而变成了“大东亚战争”。

小时候，我们满脑子被灌输的是这一连的战争都是“圣战”，是建立在“八紘一宇”、“大东亚共荣圈”的理念的基础上的。这使日本国民也深受其害。在把“新体制”作为理所当然而培养起来的日本年青人，被无情地送去当了“炮灰”。

从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各国人民来看，“圣战”实质就是企图“称霸东洋”。也正是由于这种“霸权主义”导致了日本自身的灭亡。

浑身油渍的年青人

背朝着血红的夕阳，颜色漆黑的满载着石油的油罐车的专列与客车擦肩而过。大庆油田的工人们肩负着重大的使命，他们不但为自己的国家，而且还在向面临石油危机的日本，拼命地输送着石油。

日中关系的今昔，对比相照，使我心里有一种隐隐作痛之感。“一定要子子孙孙友好下去”——快要下山的血红的夕阳好像在这么述说着。

这幅壮观的夕阳景色告近尾声时，列车也静静地驶进了萨尔图车站。

大庆油田夹着这个车站向东西南北无限地伸展开去，我们一行中一人问陪同油田到底有多大面积，但陪同只笑了笑，没作回答。

在参观中我们得知的是大庆油田一直不断地向北扩展着。因为我们看到有好几个钻探队带着钻机在向北移动。每支队伍除了两、三位老练的负责人以外，大部分都是二十二、三岁红卫兵出身的年轻人。他们的工作服上沾满了油，脸上是油渍满面。此情景给我印象很深。

广阔的平原上，跑着中国造的卡车，还有些日本造的家在夹在其中。听说探油用的是日本造的无缝钢管，这使人觉得日中关系的发展前途无量。

“向日本出口的石油不能迟延，一定要保证。周恩来总理曾直接给我们油田发出了这样的最高指令。”

在欢迎我们一行的宴会上，坐在我旁边的大庆油田革命委员会的负责人向我透露了这一事实。